

·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十）·

重申人文学术研究的常道

——工科大学里的人文教育问题

吴 俊

【内容摘要】 培养人应是大学的根本宗旨。我们必须在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的维度思考“学生为本”这一根本问题。大学如何有效地、合理地、全面地形成不同人才的成长管理、促进方式，是大学管理决策的核心问题。具体到一所工科学校的人文教育问题，需要在知识生产方式上明了人文学科和工科发展的根本不同及各自特殊性，明确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的不同机制，进而守住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常道——投入时间成本、鼓励学术个性、诉诸经验共识、立足本土研究、建立本土标准。

【关键词】 人文教育 人文学科 人文学术 工科

【作者】 吴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讲席教授。（上海 200240）

工科大学里的人文教学挑战

我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也许在一个工科传统的大学里是比较有冲击性的，一个工科人未必能够像我这样思考或者看待问题。我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工作已一年多，正在经历一个从外部到内部的过程，也即从一个文理传统兼长的大学进入到一个工科传统为主的大学的过程。作为相对资深的研究生导师，我到上海交大的第一份工作则主要是从事本科教育，现在很多大学包括上海交大对于本科生的通识课都特别重视，我觉得接下来的职业生涯就该是以本科教学而非以往的研究生教学为主了。因此，“工科大学里的人文教育问题”这个题目，在我个人而言，其契机就是因新的教学岗位的挑战而来的。

我教授的本科课程主要是大学写作、文学鉴赏和创意写作。很多工科大学包括上海交大，长





期以来少有文学性写作——现在很多时候也叫创意写作——这门课程，虽然有论文写作、科技写作等课程。我先后开设了“大学写作和文学鉴赏”和“创意写作”两门课。开课后不久，我突然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多数情况下，“创意写作”这类课程都是在文学专业、人文专业或者说在中文系、文学院、人文学院内开设的，而我在上海交大开设的创意写作课程、大学写作和文学鉴赏课程，选课的绝大多数是工科学生，文科学生只占十分之一二。

在中文系教大学写作、创意写作课，课堂上教授的内容就是学生们课堂外继续要学习的内容，两者之间完全没有门槛，没有隔断。但是，在交大上这门课的学生多是工科学生，他们只有在课堂上才进行文学写作和文学阅读，下了课他们往往就进实验室了，跟文学学习完全没有关系。这使我生出了一种忧虑。文学课对于工科学生的意义何在？难道人文教育是上几节课就有效果的吗？对学生而言这也许是得不偿失呢？文学阅读和写作绝对是需要额外成本的，这个额外成本是要在课外、课后投入时间精力的。比如，我让学生写一篇文章，在课堂上肯定完不成，但是在课外完成所需的时间肯定比他们做实验所需要的时间更长，那么，他们的专业课程任务怎么办呢？两者能够兼顾吗？今年我已经产生这样的忧虑了，这个忧虑在我上这个课程之前还没有，我在中文系教学哪会有这种忧虑呢？在工科大学里，人文课程建构了一个相对于这个大学而言截然不同的精神世界，课堂内外是两个世界，这是我个人的体会。这是挑战，而且是没有预料到的挑战，我有点懵了。

这个学期，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上海交大人文学院接收了本校内部共40多名学生的转专业申请，其中30多名被学院录取。转专业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有30多个工科、医学背景为主的学生，转专业到人文学院来就读文科。人文学院设置了三个专业方向：原有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新设的科技人文，这两个专业方向各转入11名新学生；第三个专业方向是创意写作，共转入14名新学生。下学期还会转来一批学生。保守估计，未来本校转专业进入人文学院的学生应该每年在50人以上。这是上海交大本科教学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而今后或将成为常态。

由此，文学和人文教学对于上海交大的整体利益、学生培养、师资建设等，都将发生重要的制约性作用——我不敢说决定性作用，但至少是制约性作用。学校已经面向工科学生的人文学习诉求在课程设置上做了最大程度的开放和鼓励，从中可以看出上海交大人才培养的器量，我看这也是未来高校人文教学的常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工科传统的大学如何发展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显然就会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挑战。零星的人文通识课已经不再能满足人文教学教育的需求。广义的人文学科发展必须成为工科大学的主要支撑和基础。但目前的状况是，多数工科大学里，人文学科在院系建制上都没能独立，这就形成一种制度瓶颈。

中国教育界历来有重理工轻文科的传统，这在高校院系制度设计上就能看得很清楚。我原来服务的几所文理大学的情况也类似，校领导的学科背景多是理工科，因此，基于自身工作经历，我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这些领导们可能并不完全懂文科管理，也不太懂人文评价。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思考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现在很多人说大学主要是搞科研。怎么可能呢？我以为，大学主要是培养人的，培养人是大学的根本宗旨。人文、社科、理科、工科、医科的发展方法、发展路径不同，但是，大学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宗旨，就是对人的培养。搞科研就进研究院，而大学的主体是学生，因为有学生，才对老师有要求，大学应以学生为中心，老师为学生服务。也就是说，大学师生是教学关系而非科研关系，这是大学之本。大学教育里的以人为本之本，就是学生教育和培养之本。我们必须在知识生产、人才培养上思考学生之本这一根本性问题。大学如何有效地、合理地、全面地形成不同人才的成长管理、促进方式，是大学管

理决策的核心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不能达到大学教育的目标。人不是工具，我们不能只是生产工具人。工科大学里的人文教育问题，是关系到人的精神健康、思想观念、情感成长的“人之为人”而非“工具化人”的根本性问题。遗憾的是，那些功利性、技术性的管理眼光和管理意识无法对此有自觉的认知。

人文学术的观念与特性

我想首先探讨的就是人文的特性，即人文学科和工科的区别。我们需要在知识生产方式上思考人文学科和工科发展上的不同及各自的特殊性，由此才能发现和明了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的不同机制。我想从事实、逻辑、常识、经验出发做一点讨论。

第一，从最简单、直观的现象——教学和科研的成果署名方式——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工科包括一般的理科、社会科学的成果署名方式，多数是多人合作署名，单人署名的情况相对较少。工科的成果即使有十几个作者署名，也司空见惯。我看到有文献介绍，诺贝尔奖的获奖成果中署名最多的一篇论文作者多达三十几人，包括通讯作者、第一作者，以及团队里有所贡献的人员全部署名。这在全世界工科领域、技术领域里是通约的，但是，人文成果的署名情况恰恰是相反的。人文成果的作者署名，即使在全世界范围也一直是个人独立署名占主流、占绝大多数。假如一篇人文成果，是由多人乃至十几个人署名，那恐怕不叫人文成果，而是调研报告、集体写作组文件，无论如何绝不是人文学术研究成果。真正科研意义上的人文成果的署名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个人署名或至多仅两三个人署名而已，无论是著作、论文，还是在不同国家，都概莫能外。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先不谈性质含义，还是继续解释现象意义。

成果署名代表什么？署名代表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怎么获得呢？它通过知识生产过程来获得，也就是说在成果诞生的过程当中，谁起了作用，具体做了什么工作，决定了署名的资格和署名的先后。成果署名是知识产权的标志，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代表知识生产力，知识生产过程及结果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由个人来决定。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关系在我们大学里是什么？它除了署名体现的知识产权关系外，知识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也非常重要。相比于工科知识生产的团队性和集体性，人文成果多是个人思想的结晶。一人或多人署名既是对成果知识产权归属的确认，也是对知识生产（方式）过程的个体性、独立性与群体性、合成性区别的明晰。人文学术以个体为主的生产方式，使得个体成为学术生产的充分条件；工科研究的生产力团队资源组织形式，则是技术研究逻辑上的必要条件，即工科学术生产不可能以个体方式进行并完成。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人才培养的机制包括师生关系。工科领域的师生关系多是教学与合作关系、生产伙伴关系、生产链中的契约关系，甚至还会形成劳务、雇佣关系，由此，工科的产品产权可共同使用、拥有，而不会产生抄袭和剽窃的指控。这些都与人文学科生产关系不同乃至相反。人文领域的师生关系并非合作关系，师生并非共同生产的合作伙伴，彼此没有共同生产的契约约束，无必然的劳务关系（更无雇佣关系的约束），因此也绝非产品产权的共有人，即彼此不拥有对方知识产品的产权。通俗地说，工科教学中师生首先是合作关系，这点跟人文学科大致一样，教学启动的时候双方是合作关系，但是接下来情况就不同了——工科由合作关系形成生产伙伴关系，而且生产伙伴不是随机的，而是有机组合的，但这个关系在人文学科中是不存在的。人文学科的教学关系中，导师和学生不产生科研上的合作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C刊拒绝发表两人以上或



师生合作署名文章的理由。人文学术刊物认为合作生产是不符合人文成果生产逻辑的，两个人的思想、行文风格、文体和修辞怎么可能一样呢？所以，人文学术的成果只能是各自独立生产，文责自负就是对人文学术成果的典型问责方式。在人才培养、成果评价等方面，工科和人文学科不可能形成统一适用的标准。用工科方式管理人文学科必然有悖于人文学术的常道和正道，必然戕害人文学科和人文学术。

第二，人文学术往往体现的是个体性和个人化的世界观，人文学者的专业能力培育（专业性）和道德人格成长（伦理性）融会贯通、同步发展，共同构成人文学术的生产主体性。人文学科的教学活动就是要培养学生的个体性和个人化的世界观，而这样一种世界观能力的培育部分基于专业性的养成，即每个人对世界、对象的认知依赖特定的路径，也可说是特定的专业路径。这样的专业能力的培养在人文学科的教学是与伦理性的培养合二为一的，即培育人文精神所需要的思想内涵建基于道德人格的成长，也就是，一个人文学者的专业性的培养和伦理性的成长是同步的。再言之，人文学术中的技术和人文精神不能分离。人文学者关心但并不执着于具体、细微、技术性、量化的世界，人文学术的技术性因素与目标愿景是相通的。人文领域里的个人视野往往体现出研究主体世界观的广度、高度和深度，同时不失其独特性。人文学科学术的专业性天然地具有伦理内涵，受到伦理意识的支持。同样，伦理内涵也必须落实在专业上。中国古人的一些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比如“天人合一”也可说是自然与人间、专业性与伦理性的合一。道技不分，体用一致，是人文学科、人文学术的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

第三，个体性、个人化以外，无限性的价值目标诉求也是人文学术体现其深广度的特征。这一特征呼应了人文学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怎么来理解呢？以工科实验做类比，实验的过程、方法、目的一般是寻找、确认一种最直接、最简单、最精细、最经济、最稳定和最可靠的方法，即形成一条达成目的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淘汰费钱、费时、缺乏稳定性的方法。工科实验的伟大贡献就是找到新的方法来节省地球上的各种资源，但又能造福人间生活。但是人文研究不是这样做的，人文学术的目的是用人的思想穷尽一切可能性，揭示自然和世界的无限丰富的真相。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永远不可能被穷尽，但人文的方法和目标就是穷尽一切可能性，了解这个世界的丰富性，而不是唯一性或确定性。这意味着人文学科、人文学术的研究没有标准答案，更没有唯一性的答案。如果说人文学科在某个观点、某个说法、某件事情上有唯一正确的答案，那一定是宗教式的立论，这种观点的立场不是学术性的，而往往是反现代、反人文、反人性的。世俗层面上来说，人文研究不计算经济成本，相反，路径越多，越能证明人文思想成果价值的深广度，因为越是这样的成果越能对这个世界提供更多的解释，为探索这个世界提供更多的路径。展开无限广阔的世界及其意义的可能性，这就是人文研究的价值特性。新旧更生、文化异同、民族之别、宗教观念，所有一切在人文学者看来都具有现世的意义和价值，都具有不可取代性。每种文化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地位，既往人文研究的每项探索都代表着人类对身处世界（包括未知世界）的一种努力，永远不可能过时。换句话说，那些定量的、规约的、确定的、唯一的、经济的、可重复的、闭环的方式及其代表的 worldview，绝不是人文学术的理想目标，更不能成为人文研究的评价标准。谁要是用工科的评价标准来评价人文学科学术，一定是反人文的，在学科价值观上是无知的。换句话说，这个世界的终极动因，是需要人类用很多方法来探索和体悟的，存在着一种无穷之远的远方。这也说明人文研究归根究底是对于世界的终极思考，超越工科的技术路径而向着无穷之远。人文探索的目标、意义和价值就是向着无穷之远。

第四，人文学术与工科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或前沿学术的完成方式、存在形态完全不同。工科研究的前沿相对明晰而确定。一般而言，工科前沿都以技术性目标为确认标志，只要完成某个尖端技术项目如做成多少毫米的芯片，那就是前沿成果，代表某个领域的最高水平。而人文领域的事实和认知判断与工科有着根本不同，前沿领域及成果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期性，是人文研究的特点。我们需要理解人文研究的前沿成果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人文学科学术成果的价值实现是在意义寻求和价值阐释的过程中达到的。前沿成果因具体研究过程而形成，一个论题本身并不能代表或明确自身是否具有前沿性，前沿研究需要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逻辑，形成自己的知识范畴和知识生产方式，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能够提炼出具有思想高度、深度、广度的观点或理论，一定程度上还能产生出普适性的价值应用。所以，人文前沿基本不可预定，前沿成果无法脱离具体研究的价值实现而确定。我们在意义寻求和价值生产的过程中确定并抵达前沿，这是人文学科的前沿学术之义。由此可知，人文研究的问题凝练、意义分析、价值阐释的方法及成果判断，一定迥异于工科。

在人文学科，其前沿显然不是实现技术性目标。思想、幻想、猜想、感觉、体会体验、经验表述、意识形态等，或者满足现实需求、解决现实问题、找到现实答案、提供现实方案等都可以构成人文前沿及成果方式，但这与理科、工科、社科研究在观念（理论、逻辑）、方法（实证、定量）、形态（实用、个案）上明显不同。总之，意义和价值阐释的过程（即前沿学术形成过程）是人文研究的学术独特性体现方式（即方法论呈现）。抽象点说，其具体成果的形式并不有限确定，也非唯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可能性乃至超越性（生生不息的未来发展，展望、通往无穷之远的道路和理想），这是人文学科的前沿所在。

第五，在跨语际异文化的情况下，人文学科学术存在明显的甚至天然的不可通约性，也可以说不可通约性是人文领域的常态及普遍特征，其理论形态也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人文研究具有天生的文化（情感、经验等）差异（异质性）、意识形态性、对象范围的内容和形式的差异性等。比如，中国文学不可能完全通约于美国文学、日本文学，人文各行其道，没有同一标准包括文化价值观。但是，工科领域的物理学、化学、材料学等的标准则是国际统一、世界通约的。日本近代文学的宗师夏目漱石曾举例说，西洋男女之间说“我爱你”这句话是常态，但不能想象日本男女之间会说这么一句直白表达爱情的话，“我们日本人会说：今天的月色真美啊”。那么，在特定语境中，“今天的月色真美啊”就约等于“我爱你”。这是工科思维很难或不能理解的吧。人、人文是有文化差异或异质性的。异质的意志性、意识形态性决定了人文学科的不可通约性。世界上古往今来有多少战争都是源于思想观念的冲突，这就是人文的异质性在发生作用。因此，要在人文学术里寻找统一、共识的文化价值观，很可能会失望。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则必须以全世界通用的标准为基础。

当然还可以在人文学科和工科之间归纳出其他的区别，但以上这些能够在一般层面上被理解，即人文学科和工科到底各自有什么特殊性，两者的根本性区别是什么。接下来我再来谈谈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常道。

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常道

首先，人文学术的发展和学科建设，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成本。如果说工科发展的条件在于高



水平科研团队及实验条件的话，人文学科的团队和实验条件等，都是无法在短期形成或不可能凭借外力包括人才引进这类方式形成的，而是需要人文研究人才的个体性成长及累积而成。广义上，层层累积的学科范畴（内容、对象、深广度）决定了学术发展的时间成本，这也是接续历史传统的条件。人文学术的发展需要历史化的递进或循环增值，而不可能以完成短期目标、项目型成果方式来达成。人文学科学术的时间成本具体包含个体的人格成长、人生历练、专业训练、实践经验、学术共同体支持程度、社会条件及评价标准等的成本累积，这些都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时段努力和投入。因此，任何形式的人文学科“大跃进”都非正道，都应该坚决予以抵制、反对和纠正。同样，应该坚决反对学科评估的“A+迷信”。如果说工科乃至社会科学可以通过人才引进达成团队建设及高水平发展目标，人文包括理科则不太可能简单依靠这一途径；尤其是人文学科的高水平团队不可能仅依靠经费、物质投入来打造。最贵的、无价的是时间，是人的个体生命时间，是个体生命展开的具体过程——这正是人文学术的涵养形成过程。

至于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发育成长，更加需要时间成本作为培育的代价投入，功利目的驱使的短期行为可以拼凑出纸上表格里的学科数据，却无法构成具有现实学术人际关系基础的活生生的真实的学术共同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学科学术传统的历史含义和文化价值积淀。时间凝练成的学科学术价值观是学术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和凝聚力。有一个真实的例证：近20年前，有一位著名的工科大学院士校长说，要用5年到10年的时间，把该校文科水平提升到“985”大学文科的前列，跻身第一方阵；我当时就对该校朋友说，其人文学科至少还要努力建设30年以上或许50年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近20年后，即便该校的人文学者很多已是“表格里的学者”，学科评估也合格了，但仍远未进入前列。最重要的是，学科学术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在学术共同体的实际生态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才是评价人文学科学术水平的真实基础。很遗憾的是，工科的实用性思维在超长投入、收效甚微的人文学术发展过程中，恐怕终会失去耐心。

其次，人文学术研究鼓励、推崇个性化而非标准化的学术成果，并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人文学术的成长严重依赖个体性经验包含知识、思想、感知的历练、习得、成长、成熟等，由此方可形成有学术共识、学术上互助的共同体。所谓“共识互助”的意义是：个体为本、组成共同体，但个体彼此不可取代。个体不可能胜任、提供任何一项人文问题研究的标准、唯一答案（工科实验可以做到），个体完成的是可能性的探索，提供学术共同体内的互助生产资源。因此，虽然没有标准答案，个体经验和研究成果仍将被学术共同体所检验并给出评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想的自由和自由的思想作为方法论和观念，对于人文学科学术的生长极端重要，乃至包括一般认知中的技术形式如文体或修辞，其实也是思想的特定表达形态，是思想表达的修辞方式，是一种个人经验的美学呈现。换言之，人文技术（形式）是个人化的思想表达方式，也是一种思想内容的有机构成。对此，如何能够标准化呢？

再次，人文学术的发展诉诸经验共识（经验性范畴），而非实证性技术方式及理论概念逻辑。人文学术共同体具有自身传统所自洽的经验性范式、方法，建立共识的基础是文化传统和经验，并不依赖实证（实验或技术证明、量化等）方式、纯理论的概念逻辑系统。意会神识、妙不可言之类说法可能有失玄虚，但人文学术也不可能走向科学实证这一极端，否则，人文学术将无存身之地、立身之法。

在学科化的大势潮流中，我们即便无奈也需要讲人文学科建设。但本性上，人文学术历来依赖的都不是学科化（技术化、理论化、领域化）的分类方法、实证逻辑形成的学术内涵、知识范畴、

研究方式及发展流变的传统。学科化及实证技术反而可能造成人文学术领域的混淆与蔽障。比如，历史学下中国史有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中国语言文学下有中国古典文献学，其实两者在古代典籍研究上几乎是一回事；中国语言文学有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实含有中外语言文学交叉学科内容，在中国学术语境中不妨或干脆将之归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学科化造成的学科混淆、边界模糊、内涵交叉情况十分明显，而一旦实证加持，貌似加强了学术规范，实际增添、加剧了具体研究中的乱象，特别是学科评价的力量介入后，更难免对具体研究形成片面、负面的强制性或惯性影响。

一言以蔽之，学科技术实证不能应对和处理人文学术。用前者规范来评价后者，必然导致人文学术的价值混乱。

最后，鉴于人文学术的语言和语境、基础内涵及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天然特性，人文学术必然首先以本土表达方式为主流，而非以西方和域外表达方式为主流。学术成果的发表当然也以本土期刊和传播平台为主要载体。人文学术是现代民族国家大学体系里的本土及传统文化教学研究的主要学科学术体现，这注定了以本土为主流的价值取向，应以传承本土学术为主（主流、主体）、为先（基础、起点）、为上（高层次、高地位）、为大（大局、着眼处）、为使命和生命（根本和终极目标）。中国人文学的独立和成熟就应该且必须建立自身的理论和逻辑立场，拥有相对独立自主同时具有一定开放性的价值体系，也即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体系。

有人会问：人文学者是否要发表国际期刊、外文刊物？当然可以、应该、也无妨鼓励研究者发表，但外文期刊的发表绝不应该是中国人文成果发表的主流方式，更不应该把国际、外文刊物的成果发表作为价值标准、评价标准。国际、外文刊物的成果发表不应该也不可以凌驾于中国学术刊物及成果发表的评价层级。内部并非必然通约的人文学术，怎么能以外文发表为主要评价依据甚至最高评价依据呢？回到常识上来也可加以说明，设问：大家以为最好的莎士比亚研究在哪个国家？英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在哪个国家？最好的当然是在英国、是英语学者的研究。那么，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还会是外国学者或以外文为代表的成果吗？这里，我也不想走向极端，以免引起误会：外国的中国人文研究自有其世界学术的价值，但学术研究的分流殊途（空间宽度）不能作为学术水平（高低优劣）的衡量标准，学术参照系不能成为价值坐标系。将外文研究和成果凌驾于中国本土语言成果之上的观念和倾向，实际上是反人文学术常识的，以之为评价标准更是本末倒置。

以上话题算来都是老生常谈，但在我们的日常学术和大学管理中，这些问题甚至已成积弊，没有得到基本解决，或许有些还更加严重了。作为人文学者，我在此发出又一次呼吁和呐喊，希望大学管理层为中国人文学术及学科建设设计更为合理的制度机制。

[2024年5月14日，笔者应邀在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发展中心的“教与学讲坛”第170期发表名为“工科大学里的人文教育问题”的演讲。人文学院龙其林教授据录音整理了讲稿，笔者在此基础上改订成定稿。特此致谢！]

编辑 屠毅力